臺大歷史學報第31期
2003年6月，頁325~336

BIBLID1012-8514(2003)31p.325-336
2003.1.29收稿，2003.3.10通過刊登

§歷史教學§

簡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

馮　爾　康*

關於清代歷史的研究，從清朝滅亡算起，如今已有九十年了，對於研究狀況的回顧與展望，已有學者（如高翔、何齡修等）進行了。我沒有能力作出研究性的小結，只是依據個人研治清史的體會，談一點看法。清史九十年的研究史不算短了，中外的研究者很多，最早的清代通史，還是日本人稻葉君山著作的，我這裏僅僅說明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者和下半葉大陸學者的研究成就和值得注意的問題，由於九十年的時間較長，就採取詳近略遠的方法，主要介紹近二十多年大陸學者的研究情形，採用概要法，提綱式地以一些著作為例進行說明。

一、清史研究狀況及研究機構

（一）研究階段：

1.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起步。係初步開展研究，產生許多部清朝簡史性的著述及編年性的書，重要而影響深遠的著作是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孟森的《清史講義》、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個時期研究的缺點是受反滿革命的影響，對清朝否定較多；敘述政治事件也較多，而缺少分析；這是研究起步階段的必然現象。
2. 四十至七十年代的平緩發展。有重要著作，如鄭天挺的《清史探微》；研究的內容較前一階段廣泛，對學術史和思想家、學者、

*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藝術家研究較多；另一重要內容是關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在對《紅樓夢》的研究中，涉及到它的時代背景；少數民族史及民族學田野調查開展得頗有成就。從今天對於清代通史的研究來看，此時研究的缺陷在於歷史分期方面。因為社會歷史的分期以鴉片戰爭為分界線，這就割斷了清史，造成乾嘉、道咸史之間不能通貫研究及清代通史的割裂；過分集中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影響對其他歷史事相的研討；民眾運動史（秘密結社、秘密宗教、農民戰爭和暴動）的研究受階級論影響至大，或多或少地失去客觀性。

3. 八十年代以來的大發展。來勢較猛，與其他斷代史的研究相比，顯出一種爆發力和活力；研究所涉獵的範圍較廣，舉凡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社會、民族關係、中外關係以及清朝先世的歷史（「先清史」），無所不及，檔案史料的整理與出版、研究亦在進行，此外清代史料學亦有學者關注；各種類型的著作相繼問世；研究隊伍較大。這個時期的具體研究成果，以下將做說明，這裏不作贅述。

（二）斷代研究：

在斷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尚未脫離「後進」狀態，畢竟比其他朝代的歷史研究起步晚，史料大多未經整理，研究隊伍不整齊，少見隋唐史研究那麼多的大家，需要深入進行研治的領域尚很寬廣，研究有待深入和發展。

（三）研究機構：

研究機構較多，主要的有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清史研究室和近代史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育部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南開大學清史研究室，以及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南京大學等歷史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北京、遼寧、吉林等省市的社科院歷史所。

二、關於清朝通史的研究

（一）清代通史研究專著：

蕭一山，《清代通史》，使用近代方法編寫清史的開山之作，史事敘述較多，然亦雜揉了一些歷史傳說。

孟森，《清史講義》，對清代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的認知相當深刻，影響後來的研究者。

鄭天挺，《清史簡述》，只有幾萬字的書，然而涵蓋量較大，且有通貫的觀點；他對清史的見解，另見其遺著、今年梓行的《及時學人談叢》。

戴逸主編，《簡明清史》，上、中二冊，經濟史部分有所建樹，係多人寫作，未能形成渾然一體之態。

王戎笙主持編著的《清代全史》（十卷本），各分冊主編多為明清史大家，如李洵、郭松義、韋慶遠、葉顯恩、喻松青、宓汝成等，又汲取了八十年代的清史研究成果，在某種意義上可視為二十世紀清代通史研究的不甚連貫的總括性成果。

杜家驥，《清朝簡史》，簡明而又凸出制度史的內容，是較好的清史教材。

（二）編年體通史，有兩種類型，一為編年體，一為通鑑體：

戴逸主編，《清史編年》，以朝、年為單元，每朝一冊，康熙、乾隆二朝因年久事繁，各為二冊；就我所讀過的康雍乾三朝的印象，主要依據清代歷朝實錄編寫，並且容納了許多其他文獻、外國文獻的資料，既見功力，又有價值，當然亦有可議之處，如重要事情的遺漏。

《清通鑑》：二〇〇〇年同時問世兩種《通鑑》，一南一北，南為章開沅主編的，北為戴逸主編的。南方的未得機會閱讀，北方的讀過一部分。此類書，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為藍本及標尺，非常難做，不易企及。因此有看過北方本的學者說，需要加工的地方太多，對其中的一些部分，如若寫出糾正文字，恐怕比原文還多。這類書難寫，慎重為之，是應有的態度。

（三）中國通史著作中的清史部分：

中國古代史或中國通史的各種專著，往往有清代部分，有名的是郭沫若主編的、范文瀾的、翦伯贊主編的，以及我的同事們共同撰寫的《中國古代史》。范文瀾只寫到唐朝五代，宋代以下有蔡美彪主編，其清代部分為《中國通史》第十冊（1992年），並未包括鴉片戰爭以後的清史，不過蔡美彪仍在繼續這一事業。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清代卷（上）》（1997年），也只寫到道光朝。此二書雖說出版較近，然均寫作在八十年代末，就中國通史一類的書來就是比較晚近的，因而可以參考的因素相對較多。

三、清代專門史研究

（一）政治史、制度史和帝王史：

清代各個皇帝皆有傳記，有的不止一部，例如乾隆帝（1711~1799，1736~1795在位）及其時代的，有周遠廉的《乾隆皇帝大傳》、白新良的《乾隆傳》、唐文基等的《乾隆傳》、莊吉發的《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時代》等五部，頭四種資料豐富，後一種以分析見長；用傳記體裁，反映一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和歷史事件，如拙作《雍正傳》（有臺灣商務印書館版）；專門制度史，如郭松義的《清朝典制》，較全面地涉及清朝的各項典章制度，二〇〇二年出版的白新良的《清代中樞決策研究》，論述中樞決策的機構、制度及政策的形成與貫徹；經君健、許檀等的《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

（二）社會史：

係近年熱門研究對象，研究範圍日益廣闊，且有所深入。如對疾病醫療史的研究，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和社會》，論及瘟疫流行的特徵、瘟疫的種類、疫情的地域性、傳染源，社會和政府的對策及對瘟疫的控制，是比較有意識地進行醫療社會史研究的開始階段的代表性著作。小田的《在神聖與凡俗之間——江南廟會論考》，對廟會史作出社

會學、人類學、民俗學與歷史系的跨學科研究，認為廟會具有神聖與凡俗的混合性，並非單純的神聖性，或經濟性、娛樂性。趙世瑜等的〈太陽生日：東南沿海地區對崇禎之死的歷史記憶〉，使用歷史記憶的理論，發掘鮮為人知的民族記憶。從這兩部書和一篇文章，不難瞭解社會史研究的方法多樣性和研究內容的拓展性和深入開展的狀況。

概括一代社會生活狀況的是我和常建華合著的《清人社會生活》，我寫此書，試圖建立清代社會生活史的一種研究和描述的框架，所敘述的內容從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到社會問題，以及少數民族的生活。

商人史和會館史，尤其是徽商和晉商、海商研究成績顯著，徽商的研討同徽學的產生密切相關，徽商的經營方式、道德、與家族關係、家庭、文化價值取向及自卑心理、與社區關係諸方面均有一定深度的涉及，主要研究者為葉顯恩、唐力行、張海鵬、周紹泉、王振忠等，我對徽商與揚州關係的討論，是關注移民史，即徽商通過投入當地文化教育、城市設施、河道疏浚的建設，融入地方社會。會館史有王日根的專著《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考察了會館發生、發展及其社會背景，它的社會功能和文化內涵以及歷史地位。

宗族史的研究狀況，走出先前的族權是政權附庸的定性式討論模式，考察宗族活動及族譜的社會、文化功能，與社區社會及神靈信仰等方面的關係，頗有成就的研究者有張研、朱勇、劉志偉、常建華、鄭振滿、陳支平等，趙華富開始注意到宗族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係，個人則將清代家族史的研討延伸到當代，寫出《十八世紀以來的家族的現代轉向》書稿，於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交給出版社等待印行。

秘密社會史：從陶成章的著作開始，即從二十世紀前期到八十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上是為表彰民眾運動，近期發展為兩個階段，為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學術研究，有喻松青、蔡少卿、秦寶琦、赫治清、李世瑜等人的專著，注重於會黨和白蓮教等組織的源流、發生時間、性質、文獻；如今從學術上轉向文化層面研究，有的同政府合作，研究黑社會及邪教問題。

法制社會史：開始是法典、司法審判制度研究，如張晉藩的《清朝法制史》、《清律研究》；近日研究者矚目於禮、法、習慣、情理的綜

合研究，注重司法實踐，從司法過程看民間社會、民間調解，進行法學、史學、社會學的結合研討，二〇〇二年張仁善發表《禮．法．社會——清代法律轉型與社會變遷》一書，清理出清代禮與法由合一到分離的線索，分析了禮法演變對傳統中國社會向近代社會轉變的影響，認為禮法分離是中國法制近代化的開端，也是中國政治近代化的里程碑。

（三）人口史：

清代人口爆炸，今日人口之多成為近代化的一種負擔，因而人口史為學者所留意，八十年代以來的研究似有兩個階段，前期注重人口數字，討論丁口、戶口之別，以致希望從族譜中獲得比較確切的人口數字；近來則在關注人口行為方面，即人口生育及控制，婚姻、家庭、移民，如二〇〇一年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召開「歷史上的中國人口行為國際學術討論會」，論及中國的人口控制的手段——溺嬰，婚姻論財習俗下男性失偶所造成的客觀上的控制人口生育，評論李中清、王豐的《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和中國的現實（1700~2000）》。郭松義著《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利用大量的資料說明下層社會的婚姻行為、倫理與上層社會的不同。王躍生撰著《十八世紀中國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一七八一至一七九一年個案基礎上的分析》。

（四）滿族史和民族史：

主要討論的是滿族社會文化史，漢軍旗人的族屬定位（如曹雪芹家族的旗籍），皇室研究（杜家驥的專著），八旗制度和薩滿教專著較多；北京滿學會和社科院滿學所連續召開專題研討會，閻崇年主編《滿族研究》，已經出版六輯；王鍾翰對新滿洲（錫伯族等）的研究和文獻的解讀有獨特貢獻；藏族史與藏傳佛教史的研究同步進行；蒙古史同滿蒙聯姻史的研究結合進行（杜家驥的研究成果）。

（五）思想文化史：

對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傅山、戴震、龔自珍、鄭燮和「揚州八怪」、朱耷等思想家、學者、書畫家的研究較多，涉及到學術流派，

經世致用之學、樸學、理學、公羊學的爭論與流變；近年學者提出思想、文化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研究，並有初步研究成果的展現，如劉志琴主編的多卷本文化史《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及薛君度、劉志琴主編的《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李長莉的《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

（六）中外關係史：

對傳教士及教案的研究較多，如張國剛等《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中日關係史的研究亦有成果；但整體講，研究仍屬於薄弱狀態，因為受限於外文資料的利用，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荷蘭文的有關史料尚未翻譯，基本上不能使用到研究中來。

（七）華僑史和海外貿易史：

晚清海外移民史及僑民與家鄉、祖國的關係。近年研究發展迅速，楊國楨、李慶新等多有成果，個人作有《晚清南洋華僑與中國近代化》。

（八）十八世紀的中國史研究：

一九九四年有專門研討會的召開；一九九九年戴逸主編的《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問世，含九卷，為導論、政治、軍事、邊疆民族、農民、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對外關係。

四、清史的主要史籍、出版及研究

（一）《清實錄》（「清歷朝實錄」）：

各朝分纂實錄，如乾隆朝，曰《高宗純皇帝實錄》（即《清高宗實錄》），後世印刷歷朝實錄，名曰《清實錄》，已印有臺灣版，北京中華書局與四川巴蜀書社合印本。它的內容浩繁，資料豐富，共有四千三百六十三卷，乾隆朝為一千五百卷，為清史研究的必讀史料。附帶說一下《東華錄》，有蔣良騏、王先謙分別編寫的幾種本子，亦係編年體寫法，蔣氏之作有實錄所沒有的內容，而王氏之書部頭較大，在清實錄印

刷稀少之時，研究清史得以其為基本史料讀物。

（二）《起居注冊》：

歷朝所修，編年體寫法，數量大，一般是一月一冊或二冊，今日的出版品，以朝命名，如《康熙朝起居注》、《雍正朝起居注冊》，內容上，大事之外，側重皇帝個人活動，以及某些政策的討論過程。由於是當日紀錄，一月後整理，次年年初定稿，故其形成早於「實錄」，更是第一手史料，價值甚高。

（三）「朱批諭旨」、「上諭檔」、「履歷引見檔」等：

「朱批諭旨」已出版的是康熙、雍正兩朝的，各有滿漢文本，以雍正帝（1678~1735，1723~1735在位）的《朱批諭旨》最為著名與有學術價值，宮崎市定等日本學者對它連續進行了十九年的研討，可知它的特殊價值；清朝皇帝在對知縣以上的地方官，乃至低於知縣的地方稅務官員的任命之前，官員自身及其主管部門都要寫出他的履歷，皇帝在接見時亦會寫出對該員印象的評語，然後才會作出任用的決定，這樣就形成了「履歷引見檔」，今藏於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已於九十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從這類檔案中可以獲知官員任用的程序、標準與皇帝的勤政狀況及其從政能力。

（四）檔案：

數量最巨大，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一千萬件冊以上，臺北故宮博物院亦多，有兩百零四箱，如傳記檔中的各種人物傳記稿本，各種稿本的本紀。此外遼寧省檔案館、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亦多。山東曲阜藏有大量的孔府檔案。檔案的保存、編目與圖書不同，區分為全宗（以存檔的衙門命名），下分類別，分朝年，如內閣全宗、刑科題本、土地債務類、或婚姻姦情類，擁有經濟史、社會史最好之材料。他如內務府全宗、宗人府全宗為研究皇家生活的不可忽缺的史料。檔案的編輯出版物甚多。

（五）地方史志：

主要是地方志，有官修制度作保證，所修甚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所著錄的今存八千二百多種方志，有一半以上是清代編修的。方志不僅有地方人文社會的資料，還注意到生態環境資料的保存。

（六）族譜：

是中國歷史文獻的一大特色，今日保存的數量之鉅，以萬計數，見於《中國家譜綜合目錄》的就有一萬四千多種。它是家族史、人口史、婚姻史、地方史的基本史料之一。

（七）文集：

清人詩文集，數量鉅大，二〇〇一年梓刻的柯愈春編《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介紹四萬餘種別集；這些集子蘊藏清代歷史的方方面面的寶貴資料。

（八）《四庫全書》：

乾隆年間編輯的《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叢書，當時抄寫七部，今有臺灣商務印書館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它彙集乾隆以前的圖籍，包括許多清人的著作；同時纂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逐一評說所收圖書與存目圖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全書》存目而未收之書，臺灣莊嚴文化事業公司予以印行。

《四庫毀禁書叢刊》：編輯《四庫全書》時毀禁的書籍，臺灣偉文圖書出版社於一九七七年刻印一部分，北京出版社於一九九七年全部印刷。

《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忽視的古籍，以及乾隆以後出現的重要書籍，學者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從事選擇與撰寫提要，予以結集，於九十年代蕆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刻行世；《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由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濟南齊魯書社出版。

（九）清史史料學的研究：

對於汗牛充棟的清代文獻，有的學者進行了史料學的研究，以便清史研究者的利用，出現以下作品：

莊吉發，《清史史料論述》，文史哲出版社。

陳恭祿，《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北京中華書局。
沈雲龍，《近代史史料考釋》，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拙作《清史史料學初稿》，南開大學出版社。
拙作《清史史料學》，臺灣商務印書館。
拙作《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五、《清史稿》及開始啟動的「大清史」的編纂

（一）《清史稿》的編纂（1914年啟動）與出版（1928年關外一次本；1977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版），係不可廢棄之書，然而錯誤百出，不足以令人相信，總為後人所不滿。

（二）對《清史稿》略事增刪的《清史》（8冊，臺北：國防研究院，1961）與對《清史稿》糾誤的《清史稿校注》（18冊，臺北：國史館與臺北故宮博物院合作，1990）。糾謬的書比原書的分量大得多，可知《清史稿》的誤失實在太多，所以臺北有關人士希望重修。

（三）開始啟動的「大清史」工程：大陸清史學者病詬《清史稿》，又有隔代修史的情結和使命感，除五六十年代在小範圍協商之外，於八十年代前期提出編寫大型清史（俗稱「大清史」）的規畫，預期取代《清史稿》，為古代紀傳體史書作一終結，然因編修這樣的巨著條件尚未成熟（檔案史料整理有待加強，專題研究尚不深入），未能獲得有關方面允准，二十一世紀到來，權威學者再次倡議，得到批准，於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中旬正式成立編纂委員會，可視作工作開展之始。據聞二〇〇三年一月將會有大規模的會議宣傳此事。史學界之外，有人對此作法持有異議，認為如今再修那樣的史書已經沒有意義。這部書怎麼樣修，如何才能修好，是個嚴肅的問題，需要集思廣益，博採眾長，謹慎而為，庶幾少出紕漏，編寫得像點樣子，質量盡可能好一點，避免貽譏後世，重蹈《清史稿》的覆轍。

六、感言

我在臺灣，不斷有人問我海峽兩岸的大學生有什麼同異，在作講演時也有同學問到這個問題。兩岸的大學生我所知有限，在大陸主要是我所服務的學校——南開大學，在這裏因時間短，接近的僅是暨南大學的學生，所知就更少了。這裏只能講一點感受。在研究生方面，我覺得此間的同學有理想有追求，一般三年半、四年，甚或更多時間才能畢業，取得學位，而在大陸三年必然取得學位。因此有一次問一位同學，你學這麼長時間，只為拿個碩士學位，不覺得虧嗎？她回答得很乾脆：我對所作的海外華人歷史的課題非常有興趣，一心想把它寫好，所以不計時間得失。我聽了頗為慚愧，我以目前大陸的碩士生的狀況來看待這群暨南大學的研究生了。他們是有抱負的，不是為拿學位而上學，是衝著理想而來的，自然學習興趣濃厚，不達到目標不罷休了。我想起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許大齡的研究生論文，是關於清代捐納制度的，學術價值高，能夠出版，而自己六十年代初哪裡能寫出發表的研究生論文，當時就甚為慚愧，而近日在臺灣碩士論文問世的很多，臺灣大學就很有幾位。我還看到中央大學歷史所的研究生編輯的《史匯》，所披露的文章有相當質量，有的我就複印作參考。聽說輔仁大學歷史所的學生論文（世界史方面的）也有刊物問世，惟因我研治中國史，未能去閱覽。不論學生學得如何，在沒有淘汰的狀況下，要想提高學生學習質量，是沒有可能的，大陸幾乎是百分之百地按期畢業，難免有濫竽充數的了。所以我對臺灣的研究生頗多好感。

在大學部，大陸考生多，七、八十年代之交，二十多名考生才有一人有機會入學，那時普遍素質好，能考上名牌大學的更是人才，這種情形後來有所改變，學生的狀況也因之有所下降。但是考生仍多，有好些省因學生多，實行預考制度，高中畢業生要在省裏通過預考才能參加高考，可見入學較難，這樣，學生質量仍有保障，尤其在名牌大學，因此我感到大學生相對用功些，而且水平相對整齊一些。不過近幾年學生愛玩的增多，除了寒暑假，每年「五一」、「十一」的放長假，不少學生關心的是如何玩好。臺灣入學率高達百分之八十，我聽朋友講，有人開

玩笑說，「要想考不上大學倒是困難的」，於是出現水準參差不齊的現象，我發現許多同學學得很好，讀書很多，也能思考問題，也有一些同學沒有認真地讀書，作業簡單，而卻關心分數，因此就用「惜時」二字勉勵同學。「寸金難買寸光陰」、「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這是老話，年輕人聽著可能反感，然而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可不要到老年有所「悲」呀！

兩岸的學生還有一點不同，似乎臺灣學生單純一點，保留了中華文明的某些優良傳統，如尊師。我常聽到人們講，某某是我老師，其實某某不過是他入研究所的考試或論文答辯的參加者，或論文審閱人，這種情形在大陸是不當作一回事的，若要說起來，基本上也是開玩笑式的。就我個人體會講，得到許多同學的幫助，我上兩門課，都有同學開車接送。課外領我外出觀光，幫助借圖書，複印資料，開設電子郵件信箱，甚至幫助購物。我因為感到他們是真誠的，所以才接受他們的好意。

大陸出身農村的學生往往具有刻苦求學的精神，學習是他們的主要出路，或者說唯一的通途，他們學不好，幾乎沒有在大城市工作的可能。他們砥礪向學，成為菁英，出國留學，到合資、獨資企業做白領人士，而大城市的學生，有的就較差，學的不理想，也能留在大城市。環境影響人，誠然如此。當然，關鍵是看個人的生活理念，什麼情況下的人都有學習優異的。

（責任編輯：黃裕元　校對：鍾旻圜　郭恩秀）